

更密切的合作，更寬廣的視野

李孝悌*



我於 1982 年進入中研院近史所工作，1985 年獲得國科會補助，赴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委員會攻讀博士，1989 年返國。其間先出版了一本中文專著，1996 年才寫完博士論文，取得學位。1997 年轉到史語所，任職迄今。

我過去幾年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近代上海的大眾文化，一是明清時期的士大夫文化與城市文化。前者基本上延伸我在 1996 年寫完的博士論文。另外，我在 2007 年和海德堡大學的「中國近代的百科全書」研究群合作，為他們預計用英文出版的論文集寫了一篇背景性的文章，〈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這篇文章雖然是為了不同的課題而寫，但我因此對晚清活躍在上海的文人、出版家和整體的文化狀況有了更多的瞭解，可視為我對近代上海研究的接續。

在長期研究現代和大眾文化之後，我愈來愈覺得有必要跳脫西方 / 現代的範式，用一個比較新的文化史視野，去重新發掘傳統 / 士大夫文化的豐富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國科會人文處歷史學門新任召集人

性。不論是西力衝擊或過去關於傳統上層政治及思想的研究，都清楚地確立了明清與近代中國發展的主要軸線和基本架構；我對明清士大夫文化的研究，則是希望在這些大論述和歷史發展的主流之外，發掘中國傳統文化更豐富細緻的內涵。

這些對二十世紀上海及傳統明清士大夫文化的研究，又都以城市為主要場景。在明清城市這個部分，我曾以揚州為背景，處理了幾個士大夫的生活史。討論的課題包括了戲曲、園林、聲色、飲食、宗教，以及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詩酒酬酢、宴游活動及對江南景物的流連。在這個過程中，我進一步了解到，對許多明清之際的士大夫而言，明末金陵才是回憶和歡樂的活水源頭。我的研究重心也一步步上移，先是從二十世紀的上海轉到十七、十八世紀的揚州，並進而上溯到明末的南京。

在未來幾年，我將以明清南京為主要研究課題，探討文人記事、地方志和鄉里志中所呈現的南京城市生活細節和歷史、文化傳承。並進而藉著圖像和外國人的遊記，來探討南京作為一個具有「國際性都會」性質的風貌。

由於我不久前才接下學門召集人的工作，對召集人在例行性的補助、審查工作之外，還能夠進一步擔任何種角色，還不十分確定。但如果有可能，我願意在下面幾個方向作一些嘗試：

（一）強化與國際學術界的合作

我在過去幾年中，和一批國內的年輕學者進行了六年的中國城市史研究。由於研究的角度比較新穎，在台灣，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引起極大的迴響。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常常擔心如果同一批研究團隊關起門來，自我重複，再新穎有趣的課題也會落入一個窠臼。為了避免陷入這種困境，我們在過去幾年分別在中國大陸、歐洲、美國及日本，和當地的學者合作召開會議。而在這些和世界各地學者的對話、合作過程中，讓我更加確信，中國史的研究，其實和世界史或其他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一樣，都是一門國際性的學術領域。我們做中國史研究，雖然有一些先天的優勢，但在觀點、視野和人才素質上，未必領先。以我研究的明清和近現代史來說，西方、日本乃至東南亞各地學者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如何持續與國際學術界合作、交流，而不劃地自限，是我們應該保持警覺的課題。

以我初步的瞭解，中國史，除了明清及近現代史外，其他次領域，也都與國際學術界維持相當的合作關係。相對而言，臺灣史的國際化—包括與中國大陸及西方世界的交流—則有待加強。

（二）加強研究生與國際學術界及中國大陸的合作

我在教育部顧問室任職期間，和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合作推動了一項國際年輕學者漢學營的計畫，希望能夠讓世界各地優秀的研究生和臺灣的研究生彼此認識、瞭解。這個計畫一直到今天，還由王德威教授持續推動，成效良好。因此如何建立或維持各種機制，讓臺灣的研究生願意與國際學術界接觸，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建立更多的管道，讓臺灣從事中國史及臺灣史研究的研究生乃至大學生，到中國大陸作田野考察，參加研習營或學術會議。

（三）持續推動世界史的研究

臺灣的世界史研究，在最近幾年內漸漸成型，許多大學表現優異的學生選擇世界史為專攻的範圍，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返國在大學任教或在中研院史語所等學術機構，作原創性的研究。世界史從早期的單純教學演變到今天有作原創性學術研究的能力。我們將以過去幾年的努力為基礎，希望藉著「台灣世界史討論會」一類計畫的推動，提升台灣世界史研究的水準。

（四）目前國科會有專書寫作的補助

除此之外，我們似乎也可以考慮補助學者，以中文、外文修改、出版博士論文。我知道有些同事，和我一樣，在完成博士論文後，為了升等、補助等因素，被迫不斷地申請新的計畫，而把博士論文束諸高閣，實在是相當可惜的事。如果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和經費，補助學者出國或利用中研院、各大學的人文社會中心等機構，專心修改博士論文，也許可以改善目前的狀況。

過去半個世紀，西方史學的發展日新月異，新的理論、視野和作品不斷出現。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史學在過去幾年也有快速的變遷，這對我們來說，都是一些新的挑戰，如何在台灣史學界既有的札實學風下，維持與國外學術界的對話、交流，在趨新驚時和陳陳相因、劃地自限間維持均衡，是我們都必須面對的課題。